

地方官员任职经历、公共转移支付与居民消费不平等

周广肃 张牧扬 樊纲*

摘要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微观面板数据，以及相匹配的城市层级的地方官员和宏观数据，探讨了地方官员本地任职经历对各地消费不平等程度的影响。结论表明，市委书记如果具有本地任职经历，则该城市居民的消费基尼系数低 2.5 个百分点，这一效果主要来源于中下部消费差距的显著性降低。对影响机制的进一步探讨发现，地方官员主要通过提高当地居民的公共转移支付收入，尤其是低收入水平家庭的公共转移支付收入，来缓解消费差距的扩大。

关键词 官员异地任职，消费不平等，转移支付

DOI: 10.13821/j.cnki.ceq.2019.04.03

一、引言

在现代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国家和地方领导人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Jones and Olken, 2005)。不论一国采用何种政治制度，也不管是基于公民的意愿还是国家的意志，要使一个国家或者地区获得更好的经济表现，需要其政府及领导人表现出非凡的智慧与能力，而不是一味地投选民所好 (Fearon, 1999)。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地方政府领导人大都具有深厚的当地背景不同，我国的地方政府官员存在广泛的地区间交流。地方官员的异地任职，一方面是中央对于地方官员能力的考察和培养 (Yao and Zhang, 2015)，另一方面也可以防止地方利益集团的产生 (Landry, 2008)。

1994 年财政分税制改革以来，大多数社会性事务的事权划分给了地方政府，而地方官员出于晋升的需求，其工作重心主要放在了促进当地经济增长上，而容易忽略维护社会公平的职能 (陈硕, 2010)。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

* 周广肃，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张牧扬，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樊纲，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通信作者及地址：张牧扬，上海市国定路 777 号凤凰楼 207 室，200433；电话：(021) 65908839；E-mail：zhang.muyang@mail.shufe.edu.cn。作者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71703076、71603156)、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2014EJB004) 和上海财经大学创新团队计划的资助，感谢第 214 期珞珈青年学者经济与管理论坛和“第二届劳动经济学者论坛”参会者的有益评论。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议，文责自负。

经济效率迅速提升，这些经济成就的取得与地方官员治理水平的提升明显相关，这一论断已经得到了大量学术研究的支持（周黎安，2007）。但伴随着经济总量的快速增加，我国在分配问题上却出现了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这与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的政绩需求不无关系（马万里和李齐云，2013）。在不平等总体上升的背景下，不同地区的不平等程度也存在高低差异。目前对于不平等在地区间的差异以及地方官员如何通过当地的经济、财政政策来影响不平等的研究还十分缺乏。

与此同时，我国的地方政府官员又存在着广泛的地区间交流。从理论上来看，官员交流包括官员更替和异地任职两个概念，前者主要侧重于官员更迭所带来的摩擦，而后者更侧重于官员与任职地之间是否存在较为紧密的联系。异地任职的官员和本地出身的官员之间本身存在着长期、系统性的差异，例如异地任职的官员和当地居民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很多情况下将任职地仅仅作为暂时的工作地点（唐昊，2015），在工作上更侧重于对政绩的追求，对当地居民的福利关心较少。目前，在地方官员交流的问题上，对于更替的研究较为充分（王贤彬等，2009；陈艳艳和罗党论，2012；戴亦一等，2014），而对于异地任职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张军和高远，2007；Persson and Zhuravskaya，2016），尤其是缺少关于异地任职官员对居民福利影响的微观层面的研究。

当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更加多样和复杂，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可能会导致“社会危机陷阱”的出现。厉以宁（2013）曾指出“社会危机”是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城乡差距扩大、地区差异扩大等因素累积的结果。无论是中国官方统计¹，还是相关学者（Xie and Zhou，2014）的估计，均显示中国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经处于高位。消费相比于收入，通常能够更加全面地反映个人的福利水平，所以消费不平等相比于收入不平等，也能够更加全面地刻画经济不平等的状况（Deaton and Paxson，1994；Meyer and Sullivan，2010）。现有文献对于消费不平等的研究，较多关注社会福利政策的影响，但究竟什么影响了社会福利政策，相关的研究还比较缺乏。本文研究地方官员特征、地方政府财政政策对当地消费不平等的影响效果及相关机制，填补了这一方面研究的空白，对于中国能否成功跨越社会危机陷阱，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0 年、2012 年和 2014 年的微观面板数据，以及《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宏观数据，结合作者收集整理的地方官员资料，研究了地方官员异地任职对各地消费不平等程度的影响以及相关影响机制。本文将地方官员任职经历、政府转移支付与家户消费不平等的宏微观数据相结合，将现有文献中较为简单的“地方官员

¹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 2014 年基尼系数为 0.469。

背景——微观绩效”、较为割裂的“地方官员背景——宏观政策”，以及“宏观政策——微观绩效”的研究逻辑加以丰富和整合，形成一个完整的“地方官员背景——宏观政策——微观绩效”的逻辑链条，有助于加深理解我国地方政府政策实施的过程与绩效。另外，本文的发现也说明了各地社会保障政策会受到地方政府和官员因素的影响，因此对于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不能脱离政策的决策过程来进行，这样才能对社会保障的相关问题进行更为透彻的分析。

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官员任职经历、政府转移支付和消费不平等的相关文献进行评述，第三部分介绍所使用的宏微观数据和实证方法，第四部分汇报实证结果并对结果的异质性和稳健性进行检验，第五部分对于第四部分的结果的微观机制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第六部分对全文做简要总结并探讨政策含义。

二、文献综述及理论假说

消费相比于收入，通常能够更加全面地反映个人的福利水平，所以消费不平等相比于收入不平等，也能够更加全面地刻画经济不平等的状况（Deaton and Paxson, 1994；Meyer and Sullivan, 2010）。目前在有关消费不平等的相关文献中，一支重要的文献就集中探讨了消费不平等产生的原因以及影响因素（李涛和么海亮，2013），如收入波动与收入不平等（Krueger and Perri, 2006；邹红等，2013）、负债与预算约束（Cordoba, 2008）、家庭结构与人口老龄化（Deaton and Paxson, 1994；曲兆鹏和赵忠，2008）等。

政府的转移支付作为二次分配的一种主要方式，是平衡经济发展水平和解决贫富差距的重要手段，也是国际通行的公共政策之一。目前已有文献探讨了转移支付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但是并没有得到一致结论，而至于对消费不平等的研究更是缺乏。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的转移支付配合相应的税收制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起到“调节高收入、弥补低收入”的作用，从而降低收入和消费不平等的程度（Forteza and Rossi, 2009）。但是，也有许多研究认为，中高收入阶层由于具有经济地位和政治权利的优势，从而得到了更多的政府转移支付，最终扩大了收入和消费的不平等（Perry, 2006）。以上文献的研究结论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在于，转移支付调节收入差距的效果不仅取决于转移支付水平的高低，更重要的在于最终能够获得转移支付的群体。只有低收入群体获得水平更高的公共转移支付，社会整体的收入差距才能够减少，这也正是本文对于已有文献的补充。

值得注意的是，转移支付等社会福利政策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许多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在左翼政党执政时期，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的替代率较高，医疗保险覆盖率也较高（Allan and Scruggs, 2004；

Hessami and Uebelmesser, 2013)。Leigh (2008) 基于美国的跨州研究也发现, 相对于共和党人担任州长的州, 民主党人担任州长的州最低工资较高, 税后收入差距较小, 失业率也较低。Bargain *et al.* (2013) 发现民主党和共和党执政时期的税收政策差异可以解释 1979—2007 年美国收入差距变动的 29%。这些经验证据都表明, 不同党派意识形态和支持者群体的差异, 会影响其执政时期的社会福利政策, 从而对收入差距产生影响。

有关中国的研究, 也呈现出了不同的研究结论。桂林等 (2012) 的理论研究表明, 在一个能较好限制官员关注私人收益的社会中, 官员规模较小、公共品供给效率较高且因权力寻租而造成社会收入差距较小。一些实证研究的结论, 也提供了政府对低收入群体提供的转移支付降低了贫困和收入不平等的证据 (胡日东和王卓, 2002; 都阳和 Park, 2007; 刘柏惠和寇恩惠, 2014)。但是, 也有研究得到了相反的结论, 认为中国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并不能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收入差距 (黄祖辉等, 2003; 王小鲁和樊纲, 2005; 解垩, 2010; 范从来和张中锦, 2011)。

我国虽然是一个政治集权的单一制国家, 但在经济政策和公共政策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分权。尽管我国地方政府不存在党派竞争, 但各地执政的地方官员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具有一定的自由空间。例如尹恒和杨龙见 (2014) 的研究发现, 民营经济份额越大、个人所得税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越高、本地市场集中度越低, 地方财政福利性支出的占比就越高。张牧扬 (2013) 发现, 能力较高的官员在任期间的社会性支出相对较少。王贤彬等 (2013) 也发现, 官员学历越高, 越倾向于降低建设性支出比重而提高科教文卫支出比重。同时, 我国的地方政府官员存在广泛的地区间交流, 地方领导人在一个地方的任职经历, 长的可以达到二三十年, 短的则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针对不同国家的研究也发现, 地方官员的个人属性 (如性别、政治观点等) 会影响当地公共政策制定 (Chattopadhyay and Duflo, 2004; Gren *et al.*, 2007)。具体到本文中的情况, 地方官员的本地任职经历, 可以影响其施政偏好、与当地居民和企业的关联程度以及对当地政治和经济资源的控制程度等因素, 并将会对一个地方的税收和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产生重要影响。

我国地方官员存在广泛的异地交流, 这一现实情况从理论上可以分为两个角度: 其一是关于更替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导致的政策变动; 其二是官员交流带来的本地晋升和异地空降官员在施政策略方面的差异。现有文献中对于后者的研究还非常有限, 大多数研究限于对这两类官员任期内经济增速差异的研究 (张军和高远, 2007; Persson and Zhuravskaya, 2016), 直接研究两类官员施政策略的系统性差异的文献还很少。张莉等 (2013) 研究发现, 平均而言, 本地晋升的市长多出让约 10% 的土地, 并把这种现象归因于本地晋升的官员具有更大的合谋可能性; Persson and Zhuravskaya (2016) 则发现, 具有本地任职经历的市委书记会在财政支出中多安排社会性的支出,

从而改善当地的教育和社会福利设施。上述研究虽然都指出了地方官员是否具有本地任职经历会对当地居民和企业的长期福利产生影响，但都还聚焦于本地任职经历对财政和土地政策的影响，并未涉及微观领域的数据，因此其实证结论仅限基于宏观政策对微观主体影响的推测。

在中国传统政府治理中，“国计”与“民生”是政府官员需要面对的两个现实问题。两者既是统一的，也是矛盾的。在不同时期、对不同官吏而言，当两者存在矛盾时，其权衡取舍会根据中央政府的目标和地方的现实需要而发生变化。我国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逐渐意识到了经济高速增长并没有惠及全体居民，尤其是一些处于弱势的居民，从而导致了社会不公平的扩大。因此，如何使得地方政府从“唯GDP论”转向更多地关注民生，是近年来关于政府治理的一个重要的议题（周业安，2010）。我们也发现，不同地区的官员存在任职经历的不同，长期在本地任职的官员，有着较为丰富的本地基层工作经历，而基层工作往往与当地居民，尤其是低收入居民接触较多，因此，相较没有本地工作经历的空降官员，本地晋升的官员在财政政策上有可能会更偏向于本地区低收入居民，从而缩小本地区居民的经济不平等水平。为此，本文将主要检验如下两个假设：

假设1：相较于没有本地工作经历的空降官员，本地晋升的官员在任职期间，当地居民的经济不平等水平较低。

假设2：本地晋升的官员任职期间，给予当地低收入居民更多的转移支付，从而降低了经济不平等的水平。

三、数据与实证策略

（一）数据描述

本文所使用的微观数据主要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收集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该数据是两年一期的跟踪调查数据。CFPS旨在通过对全国代表性样本家庭的各项指标的跟踪调查来反映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情况，这项数据涵盖了三个层次的调查问卷：即村（居）问卷、家庭问卷和个人问卷。CFPS在2010年、2012年和2014年开展了三期全国调查。CFPS 2010年的调查样本覆盖了全国25个省162个县635个村庄（社区）的14 798个家户²，2012年和2014年的追访调查成功追访了近80%的家户。CFPS数据具有详细的收入和支出信息，且三轮调查具有较好的可比性，这样不仅可以准确地衡量出一个地区的消费和收入不平等的状况，还可以通过消费与收入的分项来分析相应的影响机制。下文中，我们在城市层面计算相关

² CFPS没有覆盖西藏、青海、新疆、宁夏、内蒙古、海南、香港、澳门和台湾。

的消费与收入不平等的指标³，作为城市层级回归的被解释变量，并在机制分析部分，使用家庭公共转移支付收入以及其他相关的消费和收入信息。

本文所使用的地方官员数据为城市层面的市委书记和市长信息，来源于各地政府网站及新华网等权威媒体的公开资料，经作者整理而成。本文所使用的县级市的控制变量来自《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而市辖区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几个数据库匹配之后，能够得到的样本为来自 81 个城市 5 772 户家庭的三轮追踪数据。由于 CFPS 的每一轮调查，询问的都是前一年度的情况，例如 2010 年的调查实际上询问的是 2009 年的情况；另外，由于政府的支出需要在前一年年底就做好预算，因此在匹配政府官员信息时需要再往前推一年，例如 2010 年的调查数据，实际上对应的是 2008 年的政府官员的决策。因此，本文实际使用 2008 年、2010 年和 2012 年三个年度的地方官员的信息与财政和宏观经济变量，分别匹配 2010 年、2012 年和 2014 三个年度的 CFPS 调查数据。

(二) 实证方法

本文首先在城市层面来研究地方官员特征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我们采取如下的回归方程进行分析：

$$\text{Inequality}_{it} = \beta_0 + \beta_1 \text{Lclleader}_{i,t-1} + \beta_2 G_{i,t-1} + \beta_3 X_{it} + \delta_t + \mu_{it},$$

其中， Inequality_{it} 表示第 i 个城市第 t 年的消费（或收入）不平等的衡量变量，分别为利用 CFPS 数据中家庭人均消费在城市层面计算的基尼系数和各类分位数的比值； $\text{Lclleader}_{i,t-1}$ 表示上一年度市委书记或市长是否有本地任职经历（考虑到有一部分市委书记由本市市长接任，当发生这类情况时，以担任市长之前的任职经历为准）； $G_{i,t-1}$ 为一组地方官员的特征变量，包括年龄及其平方、任期及其平方； X_{it} 表示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来自 CFPS 数据的计算（包括人均消费对数、性别比、平均年龄、平均教育、平均健康），一类来自《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包括人均土地面积对数、人均 GDP 对数、第二产业占比、第三产业占比、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对数、人均财政支出对数）； δ_t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考虑到从政策制定到实施，再到落实到家户消费有一定的滞后性，为了防止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采用 CFPS 相应调查年份前一年的市委书记或市长的特征作为关键解释变量。由于 CFPS 2010 年、2012 年和 2014 年的调查数据分别询问了家户 2009 年、2011 年和 2013 年家庭的经济状况，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一定的过程和时间，因此对于官员和城市层面数据，本文选用提前一年的数据，即分别选用 2008 年、2010 年和 2012 年的数据进行匹配。有关城市层面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a。

³ 在城市层面不平等指标的计算过程中，我们使用 CFPS 每次调查的所有样本进行计算，而不仅仅使用可以追踪的个人样本。

表1a 城市层面描述性统计量

变量	2010年			2012年			2014年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消费基尼系数	81	0.432	0.059	81	0.402	0.069	81	0.392	0.065
消费 P90/P10	81	8.319	3.221	81	6.831	2.448	81	6.323	1.931
消费 P90/P50	81	2.811	0.638	81	2.500	0.446	81	2.452	0.447
消费 P50/P10	81	2.926	0.800	81	2.689	0.684	81	2.546	0.520
收入基尼系数	81	0.427	0.073	81	0.420	0.070	81	0.426	0.086
收入 P90/P10	81	8.097	3.318	81	9.536	4.388	81	11.631	7.147
收入 P90/P50	81	2.650	0.523	81	2.396	0.413	81	2.469	0.510
收入 P50/P10	81	3.033	0.919	81	3.914	1.396	81	4.617	2.448
书记本地	81	0.148	0.357	81	0.136	0.345	81	0.074	0.264
书记年龄	81	51.778	3.847	81	52.988	3.703	81	52.778	3.633
书记任期	81	4.099	2.177	81	5.259	2.587	81	3.951	2.697
市长本地	81	0.222	0.418	81	0.185	0.391	81	0.136	0.345
市长年龄	81	49.222	4.180	81	50.506	3.915	81	50.728	3.630
市长任期	81	2.185	1.333	81	3.457	1.458	81	2.259	1.506
人均消费对数	81	8.806	0.447	81	8.909	0.421	81	9.347	0.382
性别比	81	0.480	0.026	81	0.494	0.025	81	0.495	0.022
平均年龄	81	45.367	2.714	81	44.374	2.901	81	46.015	2.689
平均教育	81	6.768	1.807	81	7.068	1.619	81	6.816	1.600
平均健康	81	0.833	0.068	81	0.826	0.054	81	0.843	0.050
人均土地面积对数	81	0.790	1.021	81	0.783	1.003	81	0.808	1.048
人均GDP对数	81	10.015	0.789	81	10.508	0.778	81	10.509	0.781
第二产业占比	81	0.501	0.140	81	0.506	0.129	81	0.506	0.140
第三产业占比	81	0.349	0.096	81	0.359	0.100	81	0.354	0.102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对数	81	9.344	0.898	81	10.051	0.850	81	10.066	0.833
人均财政支出对数	81	7.860	0.683	81	8.640	0.627	81	8.637	0.624

为了进一步分析这一效应的形成机制，本文接下来在家庭层面来研究地方官员特征影响消费不平等的微观机制，我们采用如下的回归方程进行分析：

$$\text{Dependent}_{jut} = \beta_0 + \beta_1 \text{Lclleader}_{i,t-1} + \beta_2 G_{i,t-1} + \beta_3 X_{it} + \beta_4 Z_{jut} + \beta_5 \text{Prov}_i + \delta_t + \mu_{jut},$$

其中, Dependent_{jti} 表示第 i 个城市中第 j 个家庭在第 t 年的相关被解释变量, 主要包括家庭得到的公共转移支付收入对数值; $\text{Lclleader}_{i,t-1}$ 表示上一年度市委书记或市长是否有本地任职经历; $G_{i,t-1}$ 为一组地方官员的特征变量, 包括年龄及其平方、任期及其平方; X_{it} 表示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 只使用来自《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变量; Z_{jti} 表示家庭层面和户主的相关控制变量; Prov_i 表示省级层面的固定效应; δ_t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由于本文研究市级官员特征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 所以在微观数据回归时, 我们使用城市层面的聚类标准误以防止潜在的相关性问题。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家庭问卷, 有关家庭层面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b。

表 1b 家户层面描述性统计量

变量	2010 年			2012 年			2014 年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家户收入对数	5 445	9.822	1.054	5 651	10.156	1.249	5 381	10.273	1.246
家户消费对数	5 772	9.642	0.996	5 772	9.825	0.913	5 772	10.285	0.919
公共转移支付收入对数	5 772	1.680	2.940	5 772	1.732	2.997	5 707	3.574	3.371
私人转移支付收入对数	5 772	2.458	3.425	5 772	1.476	3.103	5 772	1.279	2.912
平均消费倾向	5 445	1.088	0.842	5 651	1.008	0.889	5 381	1.235	0.927
家庭规模	5 772	3.888	1.738	5 772	3.910	1.793	5 772	3.844	1.834
少儿比例	5 772	0.313	0.251	5 772	0.229	0.216	5 772	0.232	0.228
老年人比例	5 772	0.151	0.289	5 772	0.175	0.303	5 772	0.219	0.335
户主年龄	5 772	50.114	12.053	5 772	52.105	12.054	5 772	54.105	12.054
户主男性	5 772	0.760	0.427	5 772	0.758	0.428	5 772	0.760	0.427
户主汉族	5 755	0.958	0.202	5 755	0.958	0.202	5 755	0.958	0.202
家庭存款对数	5 591	3.159	4.407	5 532	8.039	2.674	5 473	4.600	5.114
户主受教育年限	5 771	6.736	4.574	5 771	6.539	4.653	5 772	6.539	4.652
户主健康水平	5 772	0.825	0.380	5 770	0.792	0.406	5 772	0.809	0.393
家庭有人住院	5 772	0.169	0.375	5 772	0.203	0.402	5 772	0.235	0.424
户主婚姻	5 772	0.900	0.300	5 772	0.889	0.314	5 772	0.879	0.326
户主党员	5 772	0.116	0.320	5 772	0.125	0.330	5 772	0.118	0.323
非农户口城市居民	5 772	0.243	0.429	5 772	0.257	0.437	5 772	0.262	0.440
农业户口城市居民	5 772	0.206	0.405	5 772	0.200	0.400	5 772	0.203	0.402

四、基准回归结果

(一) 市委书记本地任职经历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

首先，我们在城市层面考察市委书记本地任职经历对当地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回归结果汇报在表2中。表2中四列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消费基尼系数、消费P90/P10、消费P90/P50和消费P50/P10。

第(1)列的结果显示，如果市委书记具有本地任职经历，则该地消费的基尼系数低2.5个百分点，这一效果占到2014年基尼系数均值(0.392)的6%以上，具有显著的经济效果。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相比从异地调任的官员，长期在本地任职的地方官员虽然同样面临绩效考核，但其长期扎根当地的任职经历使得他会更多考虑当地居民的社会福利。就控制变量而言，CFPS数据计算得到的平均消费水平和性别比均会对消费不平等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平均受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则会对消费不平等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些结果说明，目前中国的不平等程度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而上升，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却能够显著降低消费不平等程度。就性别比变量的结果而言，已有文献表明性别比不同通常意味着一个地区婚姻市场上竞争程度的不同，为了应对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家庭的消费和储蓄行为将会发生重要改变(Wei and Zhang, 2011)，这可能是性别比影响消费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的控制变量显示，人均财政支出能够显著降低消费不平等的程度，人均财政支出水平的提高通常意味着一个地区的居民可以享受更多的公共产品和更多的转移支付，这些财政支出方式会显著降低消费不平等程度。

表2 市委书记特征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结果

被解释变量	消费基尼系数	消费P90/P10	消费P90/P50	消费P50/P10
	(1)	(2)	(3)	(4)
书记本地	-0.025 [*] (0.012)	-1.530*** (0.507)	-0.203 [*] (0.107)	-0.317** (0.142)
书记年龄	-0.038** (0.017)	-1.322 (1.142)	-0.209 (0.214)	-0.292 (0.207)
书记年龄平方	0.000** (0.000)	0.013 (0.011)	0.002 (0.002)	0.003 (0.002)
书记任期	0.001 (0.006)	0.007 (0.281)	0.027 (0.052)	-0.018 (0.078)
书记任期平方	-0.000 (0.001)	-0.004 (0.028)	-0.004 (0.006)	0.001 (0.007)

(续表)

被解释变量	消费基尼系数	消费 P90/P10	消费 P90/P50	消费 P50/P10
	(1)	(2)	(3)	(4)
人均消费对数	0.054** (0.020)	1.675 (1.008)	0.254 (0.181)	0.299 (0.256)
性别比	0.515*** (0.144)	20.589** (7.394)	2.416 * (1.271)	5.591** (2.344)
平均年龄	-0.001 (0.001)	-0.001 (0.046)	-0.021 * (0.011)	0.019 (0.011)
平均教育	-0.008*** (0.002)	-0.214 (0.124)	-0.045 (0.029)	-0.032 (0.024)
平均健康	-0.346*** (0.106)	-13.058** (4.657)	-2.302** (0.881)	-2.686** (0.964)
人均土地面积对数	0.004 (0.007)	0.165 (0.324)	0.051 (0.061)	-0.005 (0.065)
人均 GDP 对数	-0.026 * (0.014)	-0.499 (0.566)	-0.075 (0.123)	-0.090 (0.124)
第二产业占比	0.100 (0.085)	1.853 (3.737)	1.103 (0.798)	-0.576 (0.715)
第三产业占比	0.060 (0.081)	1.223 (3.192)	0.880 (0.756)	-0.641 (0.592)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对数	0.021 (0.016)	0.310 (0.601)	-0.000 (0.139)	0.141 (0.113)
人均财政支出对数	-0.036** (0.015)	-0.905 (0.597)	-0.128 (0.125)	-0.215 (0.130)
常数项	1.348*** (0.446)	38.118 (27.331)	9.062 (5.901)	8.410 * (4.264)
年份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43	243	243	243
R 平方	0.345	0.324	0.254	0.236

注：括号中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在 10%、5% 和 1% 水平下显著。

由于基尼系数只能反映总体的不平等程度，但是无法衡量总体不平等程度一致时，具体分布形态的不同特点。表 2 的第 (2) — (4) 列分别将消费的分位数比值 P90/P10、P90/P50 和 P50/P10 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衡量消费差

距，其中 P90/P10 表示一个城市中第 90 百分位数与第 10 百分位数上个人支出之比，剩下两个变量的含义类似。采用分位数支出比来衡量消费差距，可以比较上下部消费差距、中上部消费差距和中下部消费差距所受影响效果的不同。从表 2 的第（2）—（4）的结果可以看出，市委书记具有本地任职经历，不仅可以全面地降低消费不平等的程度，而且对中下部消费差距的缩小效果略大。

然而，为了排除市委书记本地任职的城市和非本地任职的城市本身的相关特征就存在差异，从而导致两地的消费不平等程度存在不同这一可能性，我们利用 2008 年市委书记是否为本地官员将样本分为两组进行了相关特征的描述和差异性检验（限于篇幅，没有在正文中汇报结果）。结果显示本地市委书记任职的城市，消费不平等程度显著较低，而其他城市层面特征（如人均土地面积对数、人均 GDP 对数等等）均没有显著差异，从而说明这两类城市其他客观特征本质上没有显著差异。另一个可能的担心是，在上述回归模型中是否存在反向因果的可能，即上级政府是否会因为一个地方的经济不平等情况恶化而从本地提拔一名官员来替换空降的官员。从现有文献来看，由于经济不平等并没有作为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之一，也没有发现地方官员的任命与此相关。此外，我们使用滞后一期的官员数据，尽可能地解决反向因果问题。

（二）市长本地任职经历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

我国的政治制度虽然决定市委书记对一个城市各方面的政治、经济权利的控制性更强，但是市长仍然具体负责城市经济管理与公共管理工作，所以我们使用市长的相关特征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表 3 的第（1）—（4）列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消费的基尼系数和各类分位数比值。通过表 3 的第 1 列结果可以看出，如果市长具有本地任职经历，则该地消费的基尼系数低 2.5 个百分点。通过第（2）—（4）列结果的对比，仍然能得到与表 2 相一致的结论，这种不平等的降低主要来源于一个地区中下部消费不平等程度的降低。

表 3 市长特征对消费不平等指标的影响结果

被解释变量	消费基尼系数	消费 P90/P10	消费 P90/P50	消费 P50/P10
	(1)	(2)	(3)	(4)
市长本地	-0.025 *	-0.999 *	-0.072	-0.334 ***
	(0.013)	(0.528)	(0.109)	(0.10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43	243	243	243
R 平方	0.355	0.312	0.228	0.251

注：模型设定与表 2 一致，均控制了市长特征变量以及其他相关控制变量，括号中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和 *** 分别代表在 10%、5% 和 1% 水平下显著。

(三) 县委书记本地任职经历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

由于一些省份在财政方面实行了省直管县，也就是说，市级政府主要负责人对于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不如县级政府更加直接。为了解决这一潜在问题，我们在表 4 的回归当中，将解释变量换作了县委书记是否有本地任职经历的相关变量，而被解释变量为在县级层面计算的消费不平等指标。从表 4 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县委书记本地任职经历仍然对消费不平等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这与前文得到的结果一致。

表 4 县委书记特征对消费不平等指标的影响结果

被解释变量	消费基尼系数	消费 P90/P10	消费 P90/P50	消费 P50/P10
	(1)	(2)	(3)	(4)
县委书记本地	-0.016 *	-1.054 **	-0.190 **	-0.154 *
	(0.008)	(0.419)	(0.088)	(0.09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18	218	218	218
R 平方	0.032	0.060	0.039	0.045

注：模型设定与表 2 一致，均控制了县委书记特征变量以及其他相关控制变量，括号中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和 *** 分别代表在 10%、5% 和 1% 水平下显著。

(四) 市委书记本地任职经历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根据消费者理论，消费者的效用水平由消费水平决定，收入则只是直接进入预算约束方程而决定最终消费水平，而一地的财政和税收政策也均是先直接影响家庭收入而最终影响消费。如果地方官员任职经历对消费不平等产生影响，则也会反映在收入不平等上，所以本节将探讨市委书记是否本地任职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果如表 5 所示。表 5 的第 (1) — (4) 列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收入的基尼系数和各类分位数比值。通过表 5 的第 (1) 列结果可以看出，如果市委书记具有本地任职经历，则该地收入的基尼系数低 5.4 个百分点，这一效果超过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效果。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政府对低收入阶层的转移支付，并没有完全转移成为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所以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明显高于消费差距的调节作用。表 5 的第 (2) — (4) 列采用收入的分位数比值作为被解释变量，结果与消费不平等一致，即市委书记本地任职对收入不平等的调节作用更多地来源于对中低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并且仍然能够发现对收入不平等的降低作用远高于对消费不平等的降低作用。

表5 市委书记特征对收入不平等指标的影响结果

被解释变量	收入基尼系数	收入 P90/P10	收入 P90/P50	收入 P50/P10
	(1)	(2)	(3)	(4)
书记本地	-0.054*** (0.017)	-2.260** (0.988)	-0.263*** (0.087)	-0.513* (0.28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43	243	243	243
R 平方	0.133	0.236	0.133	0.286

注：模型设定与表2一致，均控制了市委书记特征变量以及其他相关控制变量，括号中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

五、政府转移支付、家户行为与宏观结果的机制探讨

在本部分，我们主要探讨市委书记本地任职经历影响消费不平等的微观机制。地方政府调节不平等的方式主要基于二次分配中的税收政策与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但税收制度相比于转移支付制度具有更强的稳定性，而转移支付制度则在很大程度上由地方政府较为灵活地决定。所以接下来，将利用家庭层面的微观数据，探究地方官员任职经历如何通过对个人的公共转移支付影响消费不平等的微观机制。

（一）市委书记本地任职经历对公共转移支付收入的影响

CFPS 数据的家庭问卷中，详细询问了家庭得到的政府公共转移支付收入数值，主要包括低保、退耕还林补助、农业补助、五保户补助、特困户补助、工伤人员供养直系亲属抚恤金、救济金、赈灾款和其他政府补助款项。⁴我们在家庭层面，将家庭得到的政府公共转移支付收入的对数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家庭所在城市市委书记的相关特征变量作为关键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⁴ 由于 CFPS2010年和2014年的调查无法获得分类别的公共转移支付的数值，而城市和农村居民通常获得的公共转移支付类别有较大差异，我们将所有样本按照城乡进行了分类，结果表明正向效果在农村样本中更为显著。这与本文的结论并不矛盾，农村人群的收入通常低于城市人群，增加农村人群的公共转移支付更加具有减少不平等的作用。

表 6 市委书记特征对家户公共转移支付收入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家户公共转移支付收入的对数值					
	OLS			Tobit		
	(1)	(2)	(3)	(4)	(5)	(6)
书记本地	0.777*** (0.274)	0.758*** (0.271)	0.648** (0.249)	2.228*** (0.776)	2.195*** (0.771)	1.839*** (0.693)
书记和城市层面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相对外生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可能内生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省份、年份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7 251	17 201	15 725	17 251	17 201	15 725
R 平方	0.176	0.184	0.241			

注：括号中为城市层面聚类标准误；*、** 和 *** 分别代表在 10%、5% 和 1% 水平下显著。

表 6 的 (1) — (3) 列为 OLS 回归得到的结果，第 (1) 列只加入市委书记的特征变量、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和省份、年份固定效应，第 (2) 列加入家庭和户主层面相对外生的控制变量，第 (3) 列加入家庭和户主层面可能的内生控制变量。各列结果相对稳健，以第 (3) 列结果为例，我们发现如果市委书记有本地任职经历，则该市家庭得到的政府公共转移支付收入要高 64.8%，这一结果说明，市委书记的本地任职经历会大大增加家庭能够得到的公共转移支付收入，这可能是缓解家庭消费不平等的重要原因。控制变量的结果受篇幅所限不再展示：就城市层面控制变量而言，第二产业比重增加会降低得到公共转移支付的数额，而人均财政支出的增加则会提高家庭得到的公共转移支付收入的数值；家庭层面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人口较多、户主男性、有成员住院的家庭得到公共转移支付的数额更高，而少儿比例较多、收入较高、户主教育和健康水平较高、户主有配偶、城市家庭得到的转移支付数额较低。这些控制变量的结果与已有文献基本一致，但是限于有些控制变量可能存在潜在内生性问题，所以这里不做过多的解释和引申。

由于能够得到公共转移支付收入的家庭必须符合某些特定条件，数据显示只有 25%—26% 的家庭得到了一定数额的公共转移支付收入，所以数据存在明显的左侧截断问题。为了克服这一问题造成的估计结果的偏误，我们在表 6 第 (4) — (6) 列展示了使用 Tobit 左侧截断模型估计得到的回归系数，模型设定与第 (1) — (3) 列一致。我们根据第 (6) 列结果计算了 Tobit 模型的边际效应，结果显示市委书记本地任职经历可以将家庭公共转移支付收入提高 65.7%，这与 OLS 模型得到的结论一致。

(二) 市委书记本地任职经历对公共转移支付收入的异质性影响

前文已述，增加的转移支付收入只有流向收入较低的家庭，才能够起到缓解收入和消费差距的作用，否则会适得其反。为了对这一问题进行验证，我们将所有家庭按照其2010年调查得到的家庭收入（去除公共转移支付收入）分为低、高收入两组，来验证这些增加的公共转移支付收入具体流向了哪些家庭，结果汇报在表7之中。表7的第(1)—(2)列中OLS回归的结果显示，市委书记本地任职对提高公共转移支付收入效果的大小和显著性，均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而降低，这一效果的具体数值从低收入组的90.8%下降到高收入组的45.0%。第(3)—(4)列是使用Tobit左侧截断模型克服数据截取问题之后的结果，得到的结论与第(1)—(2)列一致。这些结果表明，市委书记本地任职不仅提高了当地公共转移支付收入的数额，而且这些公共转移支付收入主要流向了低收入家庭，这对于收入和消费不平等的缓解至关重要。

表7 市委书记特征对不同收入层级家庭公共转移支付收入的影响

收入分组	OLS		Tobit	
	低	高	低	高
	(1)	(2)	(3)	(4)
书记本地	0.908*** (0.275)	0.450 (0.272)	2.047*** (0.685)	1.669 * (0.86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7 200	7 106	7 200	7 106
R 平方	0.205	0.281		

注：括号中为城市层面聚类标准误；*、**和***分别代表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相关控制变量与表6一致，为了节省篇幅，这里不再详细汇报。

(三) 家庭平均消费倾向随收入递减的验证

上文虽然论述了市委书记本地任职通过提高中低收入家庭的公共转移支付收入来缓解收入不平等，但是从收入到消费仍然需要经历家庭消费决策。本小节将家庭的平均消费倾向作为被解释变量，将收入对数值作为关键解释变量，通过CFPS微观数据验证平均消费倾向随收入递减的规律。表8的1—3列为使用OLS估计得到的结果，虽然加入了不同的控制变量，但是可以发现家庭平均消费倾向确实随着收入的提高而减少，收入每提高1%，平均消费倾向降低0.6个百分点〔第(3)列〕。为了进一步控制家庭层面不可观测变量的影响，表8的第(4)—(6)列使用面板数据的个体时间双固定效应模型

进行了估计，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表 8 的结果表明，对中低收入家庭给予财政转移支付，提高其收入水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因此最终会缩小消费差距。

表 8 家户收入对平均消费倾向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家庭平均消费倾向					
	OLS			Panel + FE		
	(1)	(2)	(3)	(4)	(5)	(6)
家庭收入对数	-0.509*** (0.007)	-0.549*** (0.008)	-0.601*** (0.007)	-0.690*** (0.008)	-0.706*** (0.008)	-0.701*** (0.008)
家庭相对外生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家庭可能的内生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个体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6 477	16 434	15 790	16 477	16 477	15 829
R 平方	0.483	0.504	0.540	0.565	0.570	0.571

注：括号中为城市层面聚类标准误；*、** 和 *** 分别代表在 10%、5% 和 1% 水平下显著。相关控制变量与表 6 一致，为了节省篇幅，这里不再详细汇报。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现有文献表明，对于地方政府官员的激励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各项成就的取得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决定了我国的地方政府官员存在广泛的地区间交流，官员的更替和异地任职均会对相关经济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0 年、2012 年和 2014 年的微观面板数据，以及《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宏观数据，探讨了地方官员的本地任职经历对各地消费不平等程度的影响。结果表明，一地的市委书记如果具有本地任职经历，则该地消费的基尼系数低 2.5 个百分点，这一效果占到基尼系数均值的 6% 以上，具有显著的经济效果。通过将消费的分位数比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我们发现市委书记本地任职经历对消费差距的缩小效果，主要来源于中下部消费差距的显著性降低。即使使用市长或县委书记的本地任职经历作为关键解释变量，或者使用收入差距作为主要的被解释变量，均能得到一致的结论。通过对影响机制的进一步探讨，我们发现市委书记如果具有本地任职经历，则可以显著提高当地居民的公共转移支付收入，并且主要提

高了低收入水平家庭的这一类收入。

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地方政府官员的本地任职经历对政府的转移支付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最终影响了收入分配的状况。在中国目前的发展形势下，经济增速的相对放缓伴随着较高的收入不平等状况，而政府的公共转移支付可以较为有效地促进消费公平性的实现，所以应该重视税收与转移支付政策的配套性和协同性，充分发挥二者在收入和消费分配中的重要作用。

官员的调动与异地任职，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地方官员治理中独特而重要的特征，其对于维护国家统一、考察和提拔官员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官员的频繁调动也可能导致一定程度的政策短视性和不确定性，并进而对宏观经济和微观主体行为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则发现，除了调动带来的问题，异地任职本身也会对社会公平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在对地方官员的考察和选拔过程中，如果能够确保在担任正职之前担任一定时间的副职，或者将之前外调的官员调回任职，可以有效拉近地方官员与当地居民和企业的心理距离，加深地方官员对于当地居民和企业的了解，加强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对于居民福利和企业利益的考量。

参 考 文 献

- [1] Allan, J. P., and L. Scruggs, "Political Partisanship and Welfare State Reform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4, 3 (48), 496-512.
- [2] Bargain, O., D. Neumann, M. Dolls, A. Peichl, H. Immervoll, N. Pestel, and S. Siegloch, "Partisan Tax Policy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 S., 1979-2007", IZA Discussion Paper, 2013.
- [3] 陈硕，“分税制改革、地方财政自主权与公共品供给”，《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9卷第4期，第1427—1446页。
- [4] 陈艳艳、罗党论，“地方官员更替与企业投资”，《经济研究》，2012年增刊第2期，第18—30页。
- [5] Chattopadhyay, R., and E. Duflo, "Women as Policy Makers: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Policy Experiment in India", *Econometrica*, 2004, 72 (5), 1409-1443.
- [6] Cordoba, J. C., "US Inequality: Debt Constraints or Incomplete Asset Market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08, 55 (2), 350-364.
- [7] 戴亦一、潘越、冯舒，“中国企业的慈善捐赠是一种‘政治献金’吗——来自市委书记更替的证据”，《经济研究》，2014年第2期，第74—86页。
- [8] Deaton, A. S., and C. Paxson, "Saving, Growth, and Aging in Taiwan", in Wise, D. A. (ed.), *Studies in the Economics of Aging* (pp. 331-362),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 [9] 都阳、A. Park, “中国的城市贫困：社会救助及其效应”，《经济研究》，2007年第12期，第24—33页。
- [10] 范从来、张中锦，“分项收入不平等效应与收入结构的优化”，《金融研究》，2011年第1期，第40—51页。
- [11] Fearon, J. D., "Electoral Accountability and the Control of Politicians: Selecting Good Types versus Sanctioning Poor Performance", in Przeworski, A., S. C. Stokes, and B. Manin (eds.), *De-*

- mocracy, Accountability, and Represent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2] Forteza, A., and I. Rossi, "The Contribution of Government Transfer Programs to Inequality: A Net-Benefit Approach",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ics*, 2009, 12 (1), 55-67.
- [13] Gren, H., M. Dahlberg, and E. M. Rk, "Do Politicians' Preferences Correspond to Those of the Voters? An Investigation of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Public Choice*, 2007, 130 (1-2), 137-162.
- [14] 桂林、陈宇峰、尹振东, "官员规模、公共品供给与社会收入差距: 权力寻租的视角",《经济研究》, 2012 年第 9 期, 第 140—151 页。
- [15] Hessami, Z., and S. Uebelmesser, "Empirical Determinants of in-Kind Redistribution: Partisan Biases and the Role of Inflation", *Economics Letters*, 2013, 118 (2), 318-320.
- [16] 胡日东、王卓, "收入分配差距、消费需求与转移支付的实证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2 年第 4 期, 第 29—32 页。
- [17] 黄祖辉、王敏、万广华, "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 基于转移性收入角度的分析",《管理世界》, 2003 年第 3 期, 第 70—75 页。
- [18] Jones, B. F., and B. A. Olken, "Do Leaders Matter: National Leadership and Growth since World War II",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5, 120, 835-864.
- [19] Krueger, D., and F. Perri, "Does Income Inequality Lead to Consumption Inequality? Evidence and Theory",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6, 73 (1), 163-193.
- [20] Landry, P. F.,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21] Leigh, A., "Estimating the Impact of Gubernatorial Partisanship on Policy Settings and Economic Outcomes: A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Approach",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8, 24 (1), 256-268.
- [22] 李涛、么海亮, "消费不平等问题研究综述",《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3 年第 4 期, 第 230—241 页。
- [23] 房以宁,《中国道路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年。
- [24] 刘柏惠、寇恩惠, "政府各项转移收支对城镇居民收入再分配的影响",《财贸经济》, 2014 年第 9 期, 第 36—50 页。
- [25] 马万里、李齐云, "增长型激励、中国式财政分权与收入差距",《当代财经》, 2013 年第 7 期, 第 33—46 页。
- [26] Meyer, B. D., and J. X. Sullivan, "Consump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S Since the 1960s", *University of Chicago manuscript*, 2010.
- [27] Perry, G., "Poverty Reduction and Growth: Virtuous and Vicious Circles",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006.
- [28] Persson, P., and E. Zhuravskaya, "The Limits of Career Concerns in Federalism: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16, 14 (2), 338-374.
- [29] 曲兆鹏、赵忠, "老龄化对我国农村消费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经济研究》, 2008 年第 12 期, 第 85—99 页。
- [30] 唐昊, "古代异地为官制度利与弊",《人民论坛》, 2015 年第 28 期, 第 78—80 页。
- [31] 王贤彬、徐现祥、李郇, "地方官员更替与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 2009 年第 8 卷第 4 期, 第 1301—1328 页。
- [32] 王贤彬、张莉、徐现祥, "什么决定了地方财政的支出偏向——基于地方官员的视角",《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3 年第 6 期, 第 157—167 页。

- [33] 王小鲁、樊纲，“中国收入差距的走势和影响因素分析”，《经济研究》，2005年第10期，第24—36页。
- [34] Wei, S., and X. Zhang, “The Competitive Saving Motive: Evidence from Rising Sex Ratios and Savings Rates in Chin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1, 119 (3), 511-564.
- [35] 解垩，“公共转移支付和私人转移支付对农村贫困、不平等的影响：反事实分析”，《财贸经济》，2010年第12期，第56—61页。
- [36] Xie, Y., and X. Zhou, “Income Inequality in Today’s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4, 111, 6928-6933.
- [37] Yao, Y., and M. Zhang, “Subnational Leaders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ese Citie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15, 20 (4), 405-436.
- [38] 尹恒、杨龙见，“地方财政对本地居民偏好的回应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第96—115页。
- [39] 张军、高远，“官员任期、异地交流与经济增长——来自省级经验的证据”，《经济研究》，2007年第11期，第91—103页。
- [40] 张莉、高元鼎、徐现祥，“政企合谋下的土地出让”，《管理世界》，2013年第12期，第43—51页。
- [41] 张牧扬，“晋升锦标赛下的地方官员与财政支出结构”，《世界经济文汇》，2013年第1期，第86—103页。
- [42]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第36—50页。
- [43] 周业安，“拼民生还是GDP，这是个问题”，《人民论坛》，2010年第33期，第54页。
- [44] 邹红、李奥蕾、喻开志，“消费不平等的度量、出生组分解和形成机制——兼与收入不平等比较”，《经济学》（季刊），2013年第12卷第4期，第1231—1254页。

Career Background, Public Transfer and Consumption Inequality

GUANGSU ZHOU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MUYANG ZHANG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ANG FAN*

(Peking University and NERI)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utilize the unique feature in China’s political governance of many city leaders being switched from elsewhere and its impact on expenditure inequality. U-

* Corresponding Author: Muyang Zhang, Room 207, Fenghuang Building, No. 777 Guoding Road, Shanghai, 200433, China; Tel: 86-21-65908839; E-mail: zhang.muyang@mail.shufe.edu.cn.

sing the CFPS dataset in 81 cities, we find that cities with a “local” leader enjoy an almost 6% reduction in expenditure inequality, and the gap is especially narrowed in the lower percentiles. We then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inequality reduction in terms of targeted direct transfers to low-income households. This research contributes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effect of social welfare programs on inequality reduction and the welfare losses from political governance.

Key Words cadre transfers, expenditure inequality, targeted transfer

JEL Classification D73, H75, I38